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俄】娜·费·杰米多娃 弗·斯·米亚斯尼科夫 著

黄玫 译 米镇波 审校

在华俄国外交使者 (1618~1658)

ПЕРВЫЕ
РУССКИЕ ДИПЛОМАТЫ
В КИТАЕ

在华俄国外交使者 (1618~1658)

【俄】娜·费·杰米多娃 弗·斯·米亚斯尼科夫 著
黄玫 译 米镇波 审校

ПЕРВЫЕ
РУССКИЕ ДИПЛОМАТЫ
В КИТАЕ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华俄国外交使者: 1618 ~ 1658 / (俄罗斯) 杰米多娃,
(俄罗斯) 米亚斯尼科夫著; 黄玫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2010. 10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ISBN 978 - 7 - 5097 - 1023 - 4

I. 在… II. ①杰…②米…③黄… III. 中俄关系 - 国际
关系史 - 史料 - 1618 ~ 1658 IV. D829.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2772 号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在华俄国外交使者 (1618 ~ 1658)

著 者 / [俄] 娜·费·杰米多娃 弗·斯·米亚斯尼科夫
译 者 / 黄 玫
审 校 / 米镇波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孙以年
责任校对 / 韩海超
责任印制 / 郭 妍 岳 阳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mm × 1240mm 1/32
印 张 / 6 字数 / 154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023 - 4
定 价 / 2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大正 于 沛 朱诚如

成崇德 李文海 陈 桦

邹爱莲 孟 超 徐兆仁

戴 逸

编译丛刊编委会

主编 于 沛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美〕孔飞力 王大庆 王 江

王晓秋 〔法〕巴斯蒂夫人

〔德〕达素彬 〔俄〕米亚斯尼科夫

朱政惠 刘 东 张西平

〔英〕吴芳思 杨念群 赵世瑜

耿 昇 徐 浩 徐思彦 钱乘旦

虞和平 戴 寅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ИНСТИТУТ НАРОДОВ АЗИИ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ДРЕВНИХ АКТОВ

Н. Ф. ДЕМИДОВА, В. С. МЯСНИКОВ

**ПЕРВЫЕ
РУССКИЕ ДИПЛОМАТЫ
В КИТАЕ**

**(«РОСПИСЬ» И. ПЕТЛИНА И СТАТЕЙНЫЙ
СПИСОК Ф. И. БАЙКО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ГЛАВ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66

Наталя Феборовна Демцова,
Владимир Степанович Мясников

ПЕРВЫЕ РУССКИЕ ДИПЛОМАТЫ В КИТАЕ

(《Роспись》 И. Петлина и статейный список Ф. И. Байкова)

Глав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Наука〉

本书根据“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总编辑部 1966 年版译出

谨以此书纪念学者和伟人
彼得·叶梅里扬诺维奇·斯卡契科夫

总 序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 3000 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译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 15 世纪、16 世纪开始，直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清朝从 1644 ~ 1912 年共延续了 268 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

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18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清王朝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不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搜集和积累世界各国人士关于清代中国的大量记载，汲取外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正是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以下简称“编译丛刊”）。

清朝建立之初，与世界各国曾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接触。后来中国的大门一度被关闭而后又被强行打开，这期间，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队、探险家、科学考察队蜂拥进入中国，东方古国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惊奇。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他们记录下在华的所见所闻。这些记录数量浩瀚，积存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私人手中，成为了解清代近三个世纪历史的珍贵资料。由于西方人士观察、思考和写作习惯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的记载比较具体、比较广泛、比较



注重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因而补充了中国史料记载的不足。“编译丛刊”将从中选取若干重要资料译介给国内的读者；对早年问世的具有开拓性、奠基性价值，但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的作品，我们也将同样给予关注；此外，对反映当代国外清史研究新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的学术专著，“编译丛刊”也将及时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从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有选择地介绍国外新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如西方历史学家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主要是强调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选题；又如提倡“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努力将社会精英的历史变成社会大众的历史，将千百年来隐藏在历史幕后的社会大众推上历史的前台。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研究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如社会史、人口史、民俗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心理史、社会生态史、环境史、妇女史、城市史、家庭史等等，对于纂修清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些都将在“编译丛刊”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间不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是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获得营养，从而不断发展壮大。纂修清史必须排除闭关自守的文化排外主义的干扰，破除中西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国外清史研究的一切成果，因为它们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愿“编译丛刊”在新世纪中外文化交流

——在华俄国外交使者（1618 ~ 1658）

的广阔背景下，作为一座科学的桥梁、友谊的桥梁，为纂修清史做出更多的贡献。

于 沛
2004 年 5 月

前 言

俄国人民与中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可以追溯到 17 世纪之前。似乎早在 13 世纪，在蒙古入侵俄罗斯时期，被蒙古人俘获的俄罗斯人便已到达元朝的首都北京，并且在那里的军队中服役。当时中国人称俄罗斯人为“斡罗斯人”、“兀鲁思人”。

蒙古帝国的没落并没有中断两国人民的交往。15 ~ 16 世纪，俄罗斯商人到达中亚地区，并通过当地的商人购买中国商品。中国纺织品在俄罗斯享有盛誉。西伯利亚与中亚，并且通过中亚与中国建立了经常性的贸易联系，中国的丝绒和缎子也传到西伯利亚。这种通过中亚商人而进行的间接贸易持续了整个 17 世纪。有趣的是，在 1668 ~ 1703 年间，俄罗斯商人从亚梅舍夫博览会上运到托博尔斯克的东方商品中，绝大部分是中国商品^①。

到 17 世纪，俄国与中国之间建立直接接触的先决条件已经具备。此时，俄国外交事务在与土耳其、克里米亚汗国、波斯、印度等东方各国，以及一些中亚国家的出使和贸易往来中已经积累了足

^① O. H. 维尔科夫：《17 世纪托博尔斯克市场上的中国商品》，《苏联历史》1958 年第 1 期，第 109 页。

够的经验。从另一方面而言，俄罗斯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以及其国际舞台上地位的加强，也为在远东地区展开更为积极的政治活动创造了现实条件。西伯利亚的加盟对此也大有促进，这使得俄国的疆界靠近独立的各蒙古汗国，并通过其与明帝国接近。实际上俄罗斯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与远东各国直接相邻的欧洲国家。

17世纪下半叶，俄国政府试图与蒙古各汗国和中国建立睦邻关系。但在当时，欧洲人对东亚，其中也包括中国和蒙古，认识十分模糊。的确，经印度洋到达中国的航路已经开辟，并且首先为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所利用，他们早于英国。但是，人们还不知晓从欧洲经西伯利亚到远东各国的道路，欧洲地理学家当时对这些道路的认识还都仅仅是想象。例如，当时认为，中国和印度位于鄂毕河上游，这种看法便足以为证。英国固执地请求俄国政府同意其商人经西伯利亚地区到中国去，部分也是出于这种不正确的观念。但英国人积极开拓通往中国的陆路和北方海路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想避免与欧洲列强直接竞争，当时那些国家已经稳固占据了南海及其中国沿岸。不仅如此，他们还希望从俄国人手里夺取与中国建立直接贸易联系的主动权，并且让英国商品占领西伯利亚市场。

开辟了从欧洲通往东亚、直抵太平洋沿岸这一道路的首批俄国新土地开发者和使节，为地理科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中最值得推崇的当属伊万·佩特林、费奥多尔·巴伊科夫和尼古拉·斯帕法利以及其他许多在当时的地理发现中起到极其重要作用的俄国旅行家。正是他们首次提供了有关中国以及从欧洲经由西伯利亚去往中国之途的确切消息。

俄罗斯在中国和蒙古早期外交活动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其与中亚和远东地区的地理发现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也是俄罗斯新土地开发者和首批官方使者肩上的任务，他们不仅要建立外交和贸易联系，还要对所到达的国家以及经过的路途进行详尽的描述。



俄罗斯在远东早期外交活动的另一特点，是其与西伯利亚行政当局的联系。最初，与中亚和远东各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事宜由外交衙门和喀山衙门共同管理，自 1637 年起，则由西伯利亚事务厅单独管理。西伯利亚的军政长官通常也是新土地开发考察的组织者，他们首先与被重新发现国家的封建统治者建立外交关系。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派往蒙古诸汗国和中国的第一批使团人员的组成，有别于派往西方国家的使团。

由西伯利亚各城市派出的使团成员通常为地方官员，而非出使欧洲各国的莫斯科沙皇宫廷官员。著名西伯利亚古迹专家 H. H. 奥格洛勃林曾就此写道：“西伯利亚的外交事务特别有意思。在西伯利亚，没有任何一所外交学校（诸如起到莫斯科外交官学校作用的外交衙门之类），但是每一个西伯利亚普通官员都可以期待，命运会让他获得出使并且觐见某个‘蒙古皇帝’或者卡尔梅克‘台吉’、‘王公’的机会。尽管这些偶尔的外交官们明显不求甚解，他们的‘出使工作’却中规中矩：他们不仅像名副其实的外交官一样，严格恪守当时的各种出使习俗和礼仪，而且能够完成交付给他们的任务，取得实际的成果。”^① H. H. 奥格洛勃林指出，对于当时的西伯利亚而言，这种外交“派遣”并不是偶然为之，而是形成了一个稳固的体系：“与同西伯利亚相邻的独立和半独立的蒙古、吉尔吉斯、卡尔梅克以及其他国家的统治者们建立政治和贸易关系，由此经常取得的外交胜利，通过出使谈判的方式和平占领沿边界的土地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这些非正式外交官们所做之事，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完成很多其他的‘国家事务’。他们为我们留下了十分重要的出使‘条陈’，这些‘条陈’不仅是 17 世纪中亚各领地政治史研究颇有价值的文献，而且是中亚地理和民族特点研究

① H. H. 奥格洛勃林：《17 世纪西伯利亚外交家》（出使条陈），圣彼得堡，1891，第 156 页。

的重要材料。”^①

最后，17世纪远东外交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即在向东方各国派遣使团时，总有商队随行。莫斯科政府也广泛实行此种办法，这证明了它希望扩大与东方各国之间的贸易联系。

上述特点在派遣以托木斯克的哥萨克伊万·佩特林为首的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出使中国的情况中得以体现。但在此之前，西伯利亚当局就已经多方尝试通过蒙古汗国与中国建立联系。1608年，托木斯克军政长官B. B. 涅伦斯基派哥萨克伊万·别洛戈洛夫一行前往蒙古“阿勒坦汗国和中国”。但此行没有成功，原因是阿勒坦汗与卫拉特的执政者之间发生了战争，俄罗斯哥萨克被迫返回托木斯克。再次探索前往中国的路径是在1616年，当时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И. С. 库拉金几乎是同时派出两批人马：托米勒·彼得罗夫和伊万·库尼钦使团出使卫拉特，瓦西里·秋梅涅茨，伊万·彼得罗夫使团出使喀尔喀的阿勒坦汗国。当俄罗斯使团成员到达卫拉特的各兀鲁思时，从当地的卫拉特人、喀尔喀蒙古人和中国人处得知有关蒙古和中国的消息，两国的相互关系以及通过游牧民族的阿勒坦汗国到达中国的道路。

莫斯科对西伯利亚当局的外交积极性持谨慎态度。大贵族杜马1616年12月31日的决议书可以为证。该决议不准许派使团去往阿勒坦汗国和中国。

显然，该决定的出台一方面是由于要在决定是否与蒙古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问题之前更多地搜集有关这两个国家的消息，另一方面是莫斯科当局努力将外交活动的领导权收归中央。尽管如此，俄罗斯政府并未想中断与这两个国家的联系。对此有很多事实可以证明，如组建以托木斯克的哥萨克伊万·佩特林为首的新使团，以及

^① H. H. 奥格洛勃林：《17世纪西伯利亚外交家》（出使条陈），圣彼得堡，1891，第156～157页。



与阿勒坦汗和卫拉特酋长达拉依和哈拉一胡拉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①。不言而喻，首先这可以保证避免来自卫拉特人可能的攻击（见莫斯科当局 1620 年 4 月 24 日给阿勒坦汗 1619 年 5 月来信的回函），而哈拉一胡拉被俄罗斯接受为臣属国（赐书于 1620 年 5 月 25 日交与其使臣）^②。

俄罗斯首个官方赴华考察团由伊万·佩特林率领，于 1618 年 5 月 9 日由托木斯克启程。使团的目的并非是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也没有这样的权力。它的任务是弄清通往中国的道路，获得有关这个国家本身以及其经济和政治状况的信息。从佩特林的“报告”来看，这个任务得以顺利完成。

伊万·佩特林所收集到的信息是对 17 世纪地理学的巨大贡献。这是欧洲人在世界上首次找到那时还不为人所知的经西伯利亚和蒙古草原通往中国的陆路路线，当时很多人都把中国想象为一个神话般的国度。他们不仅仅是找到了，而且还在其后留下了对经过蒙古这一漫长而艰难的路线的详尽描述，以及对他们在所到诸国所见所闻的口述。

伊万·佩特林之行对于俄罗斯的对外政治有重要意义。虽然伊万·佩特林没有外交官身份，中国政府仍视其为来自俄国的第一位代表，其发现新土地的考察也被认为是第一次出使。尽管这位考察团的领队并没有得到当时中国明朝皇帝的召见，但他的造访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蒙古引起了人们对俄罗斯的极大兴趣。关于这一点，通过佩特林带回的中国皇帝神宗（朱翊钧）给俄罗斯沙皇的信就足以为证（由于俄罗斯没有懂中国语文的翻译，这封信直到 1675

① И. Я. 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1635～1758）》，莫斯科，1964，第 136～140 页。

② 在莫斯科当局的复信中写道：“阿勒坦汗，我们的沙皇怜悯你，诏令西伯利亚各军政长官和官吏，保护你和你的土地免遭喀尔木克的卡拉库尔台吉和他的部众的袭击。”（И. Я. 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1635～1758）》，第 140 页）